

访谈

侯芷明  
张崑

中国民主季刊

第4卷 第1期  
2026年01月  
CC-BY-NC-ND

自由、免费转载分发，但须注明  
作者与出处，并不得修改及商用

# “人们希望一切都能改变”



侯芷明



张崑

**编按：**“别担心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去找玛丽，”一位中国流亡者生前曾这样嘱咐其妻子。他所说的玛丽，就是法国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ie Holzman，中文名“侯芷明”。侯芷明集学者、作家、记者、翻译家的身份于一身，长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中文教授。她以当代中国和中国异议人士为研究重心。从 1995 年开始，她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，迄今已 30 余年。在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访谈中，侯芷明教授追述了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感所思，她接触或目睹过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，以及参与过的、在国际上为促进中国人权状况所做的努力。感谢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先生接受《中国民主季刊》委托，对侯芷明教授做这个访谈。它是本刊对国际上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系列访谈计划的一部分。

**张崑（以下简称“张”）：**你出生在 1952 年的巴黎，一个战后重建、又充满思想激荡的年代。能否先请你回忆一下童年、少年时期的家庭氛围？

**侯芷明（以下简称“侯”）：**我生命的前三年几乎都是在密歇根州度过的。所以我从小就听美式英语。当然，美式英语很容易被小孩子接受。我母亲

说法语。就这样，我的童年算是……早期的国际化，由于我母亲当时英语不太好，她只跟我说法语，而我和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会用我自己也不懂什么意思的英语跟他们聊几句，其中不少成为此后我父母很喜欢提起的趣事。

后来，我和父母一起回到法国……我父亲在二战后加入了美国军队，他当时年纪太小，没有参加过战争，但他参与了战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驻留与教育项目。在那里，他教韩国学生英语，他说那段经历非常棒。学生们都很可爱；他在韩国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。

作为一名退伍军人，他有很多机会继续深造并获得奖学金。他收到的第一份奖学金让他得以在日本学习汉学一年半。于是，我们三人乘船、火车等等，一路旅行。我们去了埃及、印度、柬埔寨等等，最后才抵达日本。我对那次旅行记忆犹新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们在日本待了一年半，期间我的日语变得非常流利。但不幸的是，等我五岁半再回到日本的时候，我变得只会说法语了，日语完全忘记了。这很可惜，后来在大学里，我不得不重新学习日语。好在学习汉语也能顺便学习日语。我始终认为，我的大脑如此彻底地沉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，这对我的语言学习大有裨益。

之后，我就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法国小女孩。但很显然，我受到了当时历史的影响。而那段时期，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——确切地说，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，其历史背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。法国发生了许多恐怖袭击，因为当时有很多非常保守的人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领土，所以绝对不能让阿尔及利亚独立。甚至还发生了刺杀总统戴高乐的未遂事件。那真是一段相当可怕的时期。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第一件事是我的小学老师。有一次她走进教室……她告诉我们，我记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，但她哭了，因为她的丈夫刚刚去打仗了。显然，她非常害怕失去丈夫。我当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，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她的悲伤和痛苦。

第二件事是，我们的家庭医生（注：法国实施家庭医生制，每人都可以就近找一位医生签约为长期关系的家庭医生）因为一个 OAS（当时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极右翼组织）的成员治疗伤口，却没把他交给警察，而被判了监禁一年。结果，整整一年，我们家都没有家庭医生。一年后，他回来了。他跟我们讲了他在监狱里的生活，他被关押在雷岛（Île de Ré）的政治犯监狱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调鸡尾酒喝。他以前就爱喝酒，从监狱回来后干脆成了真正的酒鬼。

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“政治犯”。但同时，这也让我对政治犯监狱有了非常独特的印象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，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。一点也不像在演戏。

后来，1968年，我16岁了，那时的情况截然不同了。

**张：**1968年五月风暴时你在巴黎？

**侯：**我住在郊区，但去巴黎很方便。我认识了丹尼尔·科恩-本迪特，你知道，他是“五月风暴”的领导人，现在他对法国政坛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。他是法德混血。我和他们有接触，但并没有积极参与，因为我年纪太小，而且主要是因为那时我父亲第三次带我们出国。这次我们去了台湾。我稍

后会谈到那段经历。

**张：**那时，法国有多少毛派分子？

**侯：**几乎人人都是。我的感觉是——我不能肯定地说——参与“五月风暴”运动的人中，95%都是不同程度的毛派分子。

**张：**你对法国的毛派有什么印象？

**侯：**我很难理解他们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之前看过一些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但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苏联入侵布拉格，当时那个年轻人，我记得好像叫扬·帕拉赫，在布拉格市温赛斯拉斯广场自焚身亡（注：后来该广场以他为名）。这件事非常震撼，因为它是共产主义中欧的缩影。所以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也不是毛主义者，更不是苏联支持者。

**张：**你随父母第三次出国，去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。那时的你，对“中文”与“中式生活”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

**侯：**那段经历，对我来说非常愉快。首先，因为台湾当时仍然很日本化。而我对日本文化很亲切，所以很容易适应。我们住在一栋日式房屋里，铺着榻榻米，我很喜欢那里。对我来说有点异国情调，感觉非常愉悦。

**张：**没遇到适应上的困难？

**侯：**没有。我们的生活真的很愉快。但真正激发我对中文和中国兴趣的，

首先是我觉得我学得很快。因为我在台湾上的是一所外国人学校，当时台湾有很多美国人，还有军事基地等等。那里的课程很好，老师也很好，我学得也很快。后来我还请了一位家教，他来我家教我一些汉字和短语。我觉得自己学中文……很容易？不，应该说非常容易，我自己都感到惊讶。仅仅六个月后，我就能和中国人交流了。之后，我父亲去看望朋友之类的，我也会跟着去。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社交互动的质量。他们非常热情好客，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。而且，他们的互动中也充满了乐趣。中国人喜欢玩猜拳、剪刀锤子布之类的游戏。他们喜欢在公园里散步。他们有一种集体生活的氛围，这非常令人愉悦。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在法国，就比较正式，有点拘谨。你会带一束鲜花，喝一杯鸡尾酒，诸如此类。我不会说它很死板，但当时确实要正式得多。我当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包括师生关系、教授之间的关系等等，都给我很温暖的印象，这或许有点不真实，因为我对那里的社会并不了解，但这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我回到法国后，因为我生性比较懒散，我就想不如直接跳级读大学二年级吧。他们用中文面试了我，随即就同意了。于是我跳过了大一。我当时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两年就能拿到学士学位，而不是三年；三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，而不是四年。就这样，在法国待了三年后，我又回到了日本，待了将近三年。因为当时中国是闭关锁国的。就这样，1972-1975年，我先是待在日本。1975年我在台湾待了六个月。然后，九月份，我去了中国。

**张：**你为什么对中国感兴趣呢？

**侯：**因为那是我的研究课题。我学过中文，顺便又重新学了一遍日语。到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又开始说日语了。我很喜欢日本的审美，喜欢那里的人民。

但那不是我的研究课题。我的研究课题是中文。

**张：**那段历程在你的记忆中是怎样展开的？有没有一些“决定性瞬间”？

**侯：**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中，很多人信奉毛主义，而我不是，因为我去了台湾，那里不是毛派的地盘。当然，那时的台湾也是独裁的。1975年蒋介石去世的时候，我刚到台北。那一夜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非常壮观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得知蒋介石去世了。这感觉很奇怪。我并不迷信，但即便如此，那晚也令人难忘。就这样，我以某种方式见证了蒋介石的逝世，整整一个月，电视上都在哀悼，没有轻松的节目，一切都是悲伤，悲伤，悲伤。然后我到了北京，76年，这一回是毛泽东。就这样，我两种情况都看到了。最有趣的是比较这两者，它们本质上是如此相似。

**张：**相似？

**侯：**是的，因为它们的仪式是一样的：先是大家都得哭，然后是电视上也类似，接着是大家都要戴黑纱，等等。两边的仪式非常相似。这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当时想，“中国毕竟是中国，两边都是中国”。这句话不适合现在，现在两边完全不一样，可那个时候其实很相似。

但当时，我并没有在台湾感受到独裁统治。台湾确实有政治逮捕等等，但白色恐怖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。那之后，我从未感到。唯一让我感到一丝拘束的时刻是去看电影的时候。电影开始前，要唱国歌，所有人都要起立。你能感受到一点独裁统治的气息，比如对领导人的尊重等等。但那只是个细节。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关心政治，也不太政治化。但对我来说，

在台湾的生活很完美。没有任何问题。

**张：**你那个时候去大陆，会感受到很大的反差吗？

**侯：**是的，反差非常大。比如，在台湾，你可以租一套合租公寓，那套公寓里住着三个法国女人和两个台湾男人。其中一个法国女人甚至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。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想象的。我们刚到中国大陆的时候，外国人被当成魔鬼对待，和普通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在学校的同学和职员那里，你可以和他们聊聊天，但非常谨慎；你不能什么都聊。在台湾，你根本不会考虑这些！比如，我记得有个男人娶了个法国女人，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要服兵役。因为 18 岁后，你必须服三年兵役。但我们对此谈论得很坦诚，没有任何禁忌。至少，我从未感到过丝毫禁忌。在台湾的时候，如果我想去台南或者台中，只要在火车站买票就行了。

而到了中国大陆，哎呀，想去哪儿旅行，都需要授权，需要证明，买票几乎不可能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差别是巨大的。

**张：**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吗？

**侯：**冲击倒是没有，虽然我知道中国不一样，也略有耳闻。但我几乎所有的法国同学都是毛派，而我被当成了彻头彻尾的白痴。

因为我父亲是美国人，我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。在美国，阶级意识并不强烈。资产阶级、工人阶级，等等。在当时的美国，一个优秀的工人，收入可以和大学教授一样多。可以说，社会差异状况完全不同。

我认为，作为一个拥有美国和欧洲双重血统的人，我受到了这种影响，但显然，我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政治理想。我受到的影响方式不同。我在17、18岁的时候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。我最喜欢的是布科夫斯基，他的《风继续吹拂》是一部杰作。布科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一样，都曾在苏联被监禁，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家。对我来说，共产主义是可怕的。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它意味着自由的缺失和权力的暴力。

当我抵达“中国”时，我途经台湾。台湾的人说共产党是魔鬼，是恐怖分子等等。当然，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，这与我的信念相符。当我开始在中国生活时，我的信念发生了变化。不是说我接受了共产主义，我一直都反对它。在中国，我非常清楚地看到，自由在任何层面都不存在。我的同学，其中一个戴了丝带，就遭到批评。在这里，即使她留着长发，也不可能绑丝带。我亲眼目睹了自由的缺失。它非常暴力。我在中国待了四年，直到北京之春之前，当时我想：“中国人那样生活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生活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与我无关。”我接受了这一点。

**张：**这期间几个令人影响深刻的“瞬间”：1968年“五月风暴”的时候你在巴黎，1975年蒋介石去世你正在台北，1976年毛泽东去世你在北京……

**侯：**第四个时刻是1978年。对我来说，那是最重要的时刻。它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**张：**1978年“北京之春”、西单民主墙出现时，你当时是在北京的留学生？

**侯：**我是1975年去的中国，起初，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。1978年民主

墙出现时，我已经不是学生了，到了法新社做初级职员。

这期间，康生去世、周恩来去世、1976年发生四五运动、9月毛泽东去世，我一直都在北京。

我参加了康生的葬礼，葬礼在紫禁城举行。场面盛大，白色的花朵，美妙的音乐，所有的一切都美轮美奂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！但那毕竟是康生，他并不是个心肠好的人。后来周恩来去世的时候，我在北京语言学院。我们有一个洗手间，就是那种水槽，冷水。我总是很早就去洗手。当时有个中国女生在那里刷牙，一边刷一边哭。那时我并不知道，她已经知道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了。看到有人一边刷牙一边哭，我感到很震惊。然后，她告诉我：“周总理逝世了。”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当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去世时，我们会举行仪式，但我们不会哭，因为那不是我的表兄，不是我的朋友，也不是我的父亲。接下来的几周，所有老师开会的时候，都在窃窃私语。我没听到，但我知道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。他们不能让我们听，因为这太敏感了。

印象里，肃穆时期一直持续到唐山大地震。唐山大地震非常可怕，它改变了整个北京。因为在那之后，气氛彻底改变了。中国人开始到处种豆子、南瓜、玉米，人行道上也种满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非常惬意。那时，建筑业三十年都没怎么发展，居民楼里空间紧张，已经没有地方了。于是，生活外溢到公共空间，人们就把火腿摆在楼外面。正值夏天，热闹非凡，有点像是在庆祝。然后，毛泽东去世了。人们也哭了，但方式却不一样。当时我在北大，有个中国姑娘，她来参加我们一起看电视直播的毛泽东世纪念仪式的聚会。第一天晚上，她回来跟我说了几句。我问她：“你看到了

什么？”她告诉我，“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哭，但我不会哭”，其实她很正常，还有点单纯。第二天晚上，她回来告诉我，有人问她跟我说了什么。她当时有点傻，就说：“我说我没哭。”真是糟糕！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彻底变了。她几乎再也不跟我说话了。这真的让我很受伤。

之后是华国锋，但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，一切照旧。我们还是去看样板戏。我们已经看过无数遍了，但我们还是得去看。电影也是一样，没什么乐趣。但在语言学院，我和一个女人成了朋友，我们有时会一起去公园聊聊天。后来，到了 1976 年，我虽然去了北大，但一直和她保持联系。所以，那时我们偶尔还会见面。有一天，警察来问她：“你和这个女人见过 13 次。为什么？”之后，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我心想：“13 次？我都不记得了。”我以为我们可能只见过七八次。那时，她很害怕。我也很担心她。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从 1978 年春天开始，邓小平掌权，随着他开始巩固权力，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。例如，贵州的作家和诗人那年夏天去了北京，张贴了大幅海报，上面写着一些相当支持民主和自由的诗歌——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意思很明确。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邓小平下令释放了 1976 年运动的参与者。这些人，比如王军涛等被释放出狱，我相信，他们比以前更加渴望自由，因为他们经历过牢狱之灾。当你出狱后，你不想再回去；你希望一切都能改变。你能感受到那种氛围。

**张：**“人们希望一切都能改变”，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？

侯：你能在社会上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，人们开始问我一些关于我生活水平的奇怪问题。他们会说：“你从来不打扫房子吗？”我会问：“为什么你这么问？我打扫。”他们会说：“不，因为你有机器人。”实际上，我认为他们指的是洗衣机、冰箱之类的东西。这一切开始传入中国，但很晚。所以，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一种完全错误、完全理想化的印象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也能感受到一种对现代化的向往，对不同事物的向往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里，有很多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。当然，民主墙事件就是其中之一。

张：最初看到“民主墙”是什么情景？

侯：因为我会读中文，我就注意到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。起初，还有些小小的神秘感，但后来那些大字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而我们，每天都是晚上出去看大字报，因为白天害怕警察。记得那年冬天，天气很冷。11月底12月初，气温降到了零下20度。哦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我得了肺炎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这种病，也是最后一次，虽然得的是轻微的肺炎，但还是病得很厉害。

所以，每天晚上我都裹着厚厚的衣服去。因此，人们其实认不出我。但经常会有一些中国人过来和我悄悄聊天。有一次，其中一个偷偷塞给我一封信；我当时没察觉。后来我在口袋里发现了那封信。之后，中国人的反应让我始料未及。他们都对我说：“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人权，我们要这个，我们要那个……”有一个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走过来问我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吗？”我非常惊讶他竟然知道索尔仁尼琴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。我真的非常惊讶。他说：“因为如果我们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，他写不出三行字就已经被关进监狱了。”这句话深深触动

了我。我想：“这一定是真的。”因为我知道在中国，自由几乎不存在。但他居然知道索尔仁尼琴。于是，我晚上会和一些人进行一些简短而焦虑的谈话。正是在这些谈话中，我发现了任畹町、魏京生这些人的大字报。我非常感动，也很兴奋，因为它证明了中国人其实和我们一样。这让我安心了不少。之前我一直觉得，他们和我们不可能一样，这让我很担心。当我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时，我非常高兴。

**张：**这里有一个逆转。

**侯：**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期，我有很多东西要翻译。我翻译魏京生等人的作品，我陪着他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并做翻译，我们熟悉了起来，那是—段很短暂的时光，1979年3月，魏京生被捕了。

**张：**今天你如何评价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那一代中国人的理想主义？这种理想主义后来在中国社会中是如何被压抑、被转化或被延续的？

**侯：**20世纪80年代初非常令人惊讶，因为社会出现了真正的改变。例如，1979年秋天，魏京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如果是在两年前，他就会被处决。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里，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人。这是一个转折点；也就是说，政治人物被视为重罪犯，但还没有到会被处决的地步。所以，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虽然不是决定性的，但仍然意义重大。

社会开始运转起来，或许仅仅是因为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，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减少了。生活变得更容易了。我们不必每晚洗衣服，也不必每天去购

物。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百科全书热潮、翻译热潮等等。短短十年间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们什么都读；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的书籍，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。我记得当时已经有了米歇尔·福柯的译本，所有大思想家、大企业家等等的译本，还有一些电影可以观看。我参加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，也是第一场当代音乐会，由让·米歇尔·雅尔演奏。让·米歇尔·雅尔在法国也非常有名。那真是第一场现代音乐会。虽然不是摇摆舞，但有点像，节奏感很强。真正搞笑的是，观众席里虽然有几个年轻人，但大部分都是士兵！

可同时让我无比震惊的，是（83年）“严打”。它来得很突然。西安一位女士因为组织舞会，那舞会既不隐秘，也不淫乱，她竟然被判处死刑。我想说的是，对我们这些观察者来说，20世纪80年代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例如，胡耀邦被解职就令人震惊，因为胡耀邦当时地位很高。我曾在爱丽舍宫亲眼见过胡耀邦和密特朗总统在一起，我还去莫鲁瓦（Pierre Mauroy）总理家拜访了赵紫阳。所以，我有机会和赵紫阳以及胡耀邦都聊过天。胡耀邦被解职，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即使实行了改革开放，邓小平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。与此同时，方励之到处都在说“我们需要民主”等等。这些矛盾一方面令人担忧，另一方面又令人兴奋。因为方励之能够频繁地与中国学生交流，并给很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，我认为这为八九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当然，苏晓康的电影也功不可没。这两个因素至关重要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，尽管困难重重。可是对我个人而言，特别艰难的是，当你认识当事人，尤其当你真正了解一个人时，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魏京生被判刑15年，我对这种痛苦的体会就会更深。

每当我人生中拥有快乐的时刻，比如和 1980 年出生的儿子一起度假时，我都会想到，我和儿子在度假，而魏京生却身陷囹圄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一种痛苦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写了那么多关于魏京生的文章，不让他被遗忘。因为如果没有媒体和出版物报道他，这个人就会被遗忘。现在，恕我直言，我又开始关注伊力哈木·土赫提了。伊力哈木·土赫提在新疆被判处无期徒刑，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一所监狱里。2019 年，我们为他争取到了欧盟萨哈罗夫奖，他的声誉得以延续。一月份，我要去布拉格参加伊力哈木·土赫提的纪念仪式。我们一直铭记着像刘晓波那样可能死在狱中的人。这一切都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。正因如此，我无法停止。

**张：**谢谢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从中国回到法国后，继续研究汉学，对吗？

**侯：**不，不。我在巴黎七大汉学系教书，但我不是那种学术意义上的汉学家。

**张：**你最早的著作《与中国同行》（Avec les Chinois, 1981）试图向法国读者介绍怎样的“中国人”与“中国社会”？如果今天重写这本书，你会有哪些不同的选择？

**侯：**如果今天重写这本书，我不会有不同的选择。我什么也不能修改，因为它是一份证词。它记录了我当时所见所闻。所以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

**张：**是的，这不仅对你自己是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，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。我完全理解。

**侯：**谢谢。

**张：**在你的作品中，普通人的命运、日常生活与宏大政治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。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张力的？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人物时，哪一位的生命历程最令你触动？为什么？

**侯：**对我来说，影响最大的人显然是魏京生。因为，1979年3月29日，他被逮捕，后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我当时还年轻，那时对我那个年纪的人来说，15年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几年后，当我见到赵紫阳时，我对他说：“为什么不释放魏京生呢？太可惜了，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。如果他能为中国效力，而不是待在监狱里，那就更好了。”他给了我一个非同寻常的回答。他说：“魏京生还年轻，等他出狱后，还能做点什么。”他说：“如果年纪大了才进监狱，那就完了。”后来，赵紫阳被软禁在家，直到去世。我一直记得他这句话，因为他最终死于软禁之中。这就像死在监狱里一样；他一语成谶，年纪大了才被监禁，再也无法做任何事了。

魏京生在1993年被释放了大约六个月，因为中国要申请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。在9月份，他们释放了他，而奥委会的投票在10月份。可是奥委会会觉得受到了侮辱，“你们在耍我们，你们三周前才释放了他。”而中国方面表示“我们提前释放了他”。可是，魏京生已经在监狱里服刑14年半了。那不能算是表达提前释放的善意，六个月不能算，至少提前三年才算。

从1979年3月28日，到1994年3月28日，理论上，是他在监狱的15年刑期。可是，他们等到3月29日他重获自由之后，再次逮捕了他。你能想象吗？太可怕了！这件事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。当时，我召集了我认识的所有人，包括罗伯特·巴丹戴尔（1981年至1986年法国司法部长，任内促使法国在1981年10月9日废除死刑）。1994年，罗伯特·巴丹戴尔告诉我：“我

会去北京为魏京生辩护，参加他的下一次庭审。”庭审确实在 1994 年举行。但是，他失踪了一年。于是，我和他的妹妹珊珊一起去了北京。他妹妹到处打听魏京生的下落，因为他失踪了一年。他们只说他活着，但没说具体位置。事实上，他当时身处某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，就像所有被失踪的人一样。我离开中国的时候，在香港开了个小型记者会，说：“我和珊珊去了北京，打听魏京生在哪儿。”于是，我们印了明信片，问魏京生在哪儿。之后，从 1995 年开始，我就被禁止入境中国，因为我做了这件事。

**张：**直到今天？三十年了没能去中国了？

**侯：**是的，当然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显然是决定性的因素。然后，1997 年，多亏了江泽民和比尔·克林顿（的政治交易），他被送到了美国。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。他被关在山东的一个盐矿里。那段日子非常糟糕，对健康极其有害。一天晚上，他的狱警过来对他说：“你坐出租车去机场。”那可是一整夜的车程。狱警突然注意到他的裤子，说：“你不能穿着这条裤子走。”于是狱警脱下裤子给了魏京生，让他可以穿着不是囚服的裤子离开。就这样，魏京生穿着狱警的裤子抵达了美国。真是不可思议。他在机场见了家人——他的父亲、兄弟，或许还有妹妹——一个小时。之后，直到今天，他都再也回不去了。

我经常和魏小涛聊天，他是魏京生的弟弟。魏小涛后来在法国去世。他大概在 2000 年或 2001 年（我记不清了）从中国来看望他哥哥，魏京生当时在巴黎出席一个活动，他们见了面。之后，魏小涛坐飞机回国，到了机场，有人告诉他：“你回巴黎去。”就这样，他被流放了。他又回到了法国，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。我那时要处理的事务工作量很大。比如张健也刚到

法国，等等。于是我跟魏小涛说：“让你哥哥帮帮忙，这样你就能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了。”因为当时我不太喜欢魏小涛，他跟他哥哥很不一样。但一年后，魏小涛申请的政治庇护被拒绝了，美国人不接受他，魏小涛只能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。然后我就不得不帮他了。之后，我们成了朋友。我一直陪着他，直到他去世。他 2019 年去世了。我们经常聊天，就我们俩。我对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好累，什么时候可以退休？”他回答：“你永远不能退休。”我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你这个可怜的玛丽，必须照顾我们这些中国人。”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滑稽，但真的很有意思。他去世前，总是跟妻子说：“别担心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去找玛丽。”而现在，阿青（音）成了我的妹妹。

**张：**面对中国异议人士与人权议题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你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？或在某些时期被重新诠释过？还是从来都没有什么变化？

**侯：**中国每十年都会发生变化。这很不寻常。1966 年，文化大革命。1976 年，毛泽东去世。1985-86 年，胡耀邦被赶下台。但邓小平上台后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然后是 1989 年，又是一次巨大的变革。但从 1989 年到 1999 年，出现了一个新的机遇窗口，这显然是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所触发的。因此，他们准备做出很多让步。当时，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苏格兰女性玛丽·罗宾逊，是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主席。她在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她多次访问中国，正是她促成了“劳改”改为“监狱”，她帮助废除了这项法令。她说这是违法的，而且必须签署两项主要的国际公约：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和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》。但是，中国签署并批准了第一项，但从未批准第二项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

有真正的工会，因为中国没有批准第二项公约（第一项公约里的工会权在中国批准时予以保留，也就是可以不遵守——编者注）。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，也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五十个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该公约的国家。当时，关于死刑的讨论很多。她为此奔走呼吁。那时，中方表示：“好的，我们同意与你们讨论死刑问题。”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英国人权倡导者代表团从英国来到这里。他们非常兴奋。他们告诉我：“你知道吗，中方同意与我们讨论死刑问题。”但我认为那只是缓兵之计，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如此。

然后是比尔·克林顿推行的最惠国待遇。那时美国国会每年都要重新进行“最惠国待遇”审查，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去奋斗，表达立场，希望能在中有所改善之后再给他们“最惠国待遇”。总之，我们为此斗争了很多年。可是，到了2000年，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，不再需要每年审议“最惠国待遇”。人权时代结束了。这是一个转折点。一切都变成了生意。

**张：**你曾多次强调，希望让西方听到中国内部对民主的诉求。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少成功？最大的挫折来自哪里？

**侯：**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2008年奥运会。我们在2002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。得知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后，我们立即与废除酷刑协会、无国界记者组织、人权联盟、国际特赦组织等众多机构，当然还有我所在的“团结中国”组织联合起来，每月都开会。我们撰写了一本谴责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小册子。我们组织示威游行，召开了多次新闻发布会，并协助传播有关当地情况的影片。其中有一部影片，名为《前门前》，讲述了所有房屋如何被拆毁，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。还有艾未未的言论，他也持非

常批判的态度。总之，我们广泛传播了所有这些信息。当北京奥运代表团访问巴黎时，整个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。所以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种巨大的成功一直持续到 2009 年，因为 2009 年是 1989 年之后的 20 周年。在 2009 年，我受邀前往法国至少 20 个城市，谈论 1989 年。这非常重要，所以，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。

**张：**那最大的挫折呢？

**侯：**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，我们还能做（人道救援），这往往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的。因为 1975-1976 年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认识那里的美国外交官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其中一位外交官，我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，他身居要职。所以，当有政治犯或其他类似情况时，我会请他帮忙争取释放。他成功了好几次。这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，但确实奏效了。2000 年之后，就没了！再也没有人被释放了。这是世贸组织的缘故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，就再也不买那位美国外交官的帐了。

**张：**你与许多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流亡者有长期私人交往，也常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与行政事务。长期接触这些沉重的故事，你如何进行自我调适？

**侯：**实际上，我想说，直到 2010 年左右，我都深受影响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我想到一位名叫李和平的人权律师。有一天，我打开电脑，看到李和平被警察逮捕，警察还殴打了他等等。我看到这些，突然间，我意识到，我完全泪流满面。我想，这不可能，因为李和平也不算年轻。他是个颇有名望的人，我想象着他落入歹徒手中，被那样殴打，这让我感到无比恐惧。我的反应与其说是情绪化的，不如说是本能的。我当时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

泪流满面，那几乎是我最后一次经历这种事。你必须保持距离。如果你不保持距离——而很多维权人士却不知道如何保持距离——他们会生病，会疯掉，甚至会自杀。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。因为经历这一切真的太难熬了。我想那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。我心想，就算我哭，也于事无补。靠哭救不出来李和平，也改变不了中国。所以，哭也没用，也不值得！

但对我来说，最有作用的还是音乐。我父亲总是听音乐，无时无刻不在听。我是为了音乐四处旅行的人。只要有我感兴趣的音乐会，比如今年夏天我就去了芬兰。去年冬天，我去了德国的德累斯顿。明年一月，我要去巴士底狱听瓦格纳的音乐会。我热爱瓦格纳。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来说，它意义非凡。我指的是古典音乐，比如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，我年轻的时候当然很崇拜他。但现在，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会对人类灵魂有更深的理解。例如，在我丈夫于2008年去世后，我听到了一首巴赫的曲子，叫做《Bis du bei mir》，意思是“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我可以握着你的手，我死而无憾”。丈夫去世后，每次听到这首曲子，我都会哭。但同时，它又是如此美丽，如此真切。它超越了世俗，而能够超越日常世界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永远无法超越，永远停留在那个层面，那就太难了。

**张：**有没有一件小事——可能与孩子、家人或朋友有关——让你在最疲惫的时候重新感到“这一切值得”？

**侯：**我曾经有个中国朋友，他处境很艰难，他捍卫人权，却总是听到这样那样的坏消息。他一度想要自杀。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他。有一次，我给他看了我孙子和孙女的照片。我对他说：“你有个十岁的女儿吗？等你

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也会有孙子孙女的照片，那时你就会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我想他明白了。总之，他最终没有自杀。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，他一切都好。

**张：**感谢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！再次感谢你接受这个访谈。